

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伙伴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建构

刘家帆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572000)

摘要：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不同国家达成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产生了彼此交往的共有规范和规则，使互动产生更多积极意义，催生集体认同和集体情感，协调各国利益，塑造行为模式。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一直和一些国家和睦相处，试图达成互利共赢的目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网络，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目标的实现。以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视角研究中国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网络，以至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不但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可以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

关键词：中国伙伴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关系本位过程建构

前言

1993年，中国开始建立伙伴关系。截至2021年，中国伙伴关系已历经了三十年的时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愿意以伙伴关系的方式与其他国家交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国际局势变化，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中国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深刻认识到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尤其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流行趋势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努力维护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合作中促进全球疫情防疫和共同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冲击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同时加剧了国际格局和各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尤其对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国忙于应对疫情下国内出现的各种危机和挑战，更多站在本国利益的角度上思考国家对外行为、与他国关系。从世界情况来看，此次疫情暂时延缓了全球化进程，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因为控制疫情传播而减速，从而导致了产业链的脆弱和不稳定。针对产业链危机，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使得将拓展生存空间的视角更多转向本国、双边或者区域等小范围。

伙伴关系一直是中国处理与国际体系及主要成员关系的重要举措，既是中国积极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方式，还是其进一步满足和平崛起诉求以及实现终极理想的手段。以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研究中国伙伴关系，一方面能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带来新思考，另一方面可以将带有中国“关系”文化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外交实践。

一、“关系”理论辨析

(一)“关系”理论的独特视角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兴起，这三种理论解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现象。但过程建构主义认为它们都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关系，即国际体系互动过程与国际社会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复杂社会性关系。西方的主流理论的核心理念就是“理性”，但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相较于西方，其核心理念更多融入了“感性”理念。在借鉴主流建构主义的基础上，秦亚青提出有中国传统色彩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即“关系”理论，将关系融入理论之中。

在对象研究方面，结构现实主义关注物质实力的分布，没有关注关系与过程；新自由制度主义关注国际体系与单位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将过程看作一种背景，更加关注国际制度、国家间互动的的作用；结构建构主义强调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过程，只是将过程作为一种依附性因素，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主要分析对象。与以上三种西方国际理论不同的是，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即关注关系本位，强调分析过程建构，过程与关系不可分割。

(二)“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就是一种过程建构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的作用，其基本假设是国际关系世界不但是物质性的，而且更多是社会性建构的；该理论强调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总体上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进化的。其中过程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和相互建构的，共同参与并进行社会化实践；过程使行为体之间互动实践，这种互动实践又建构行为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其基本观点是：过程的核心就是关系，即过程的运动要素就是关系，过程就是运动中的关系，过程不仅可以导向结果，而且能够通过关系的流动孕化权力、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和建构行为体身份。在过程中，行为体会理性地权衡利益，但行为体不可以脱离过程，行为体与过程是一体的，通过不断的运动产生关系。过程有利于加强情感性关系，维系关系就是维系过程。

二、从关系本位视角看中国伙伴关系

秦亚青的“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就是关系本位，从关系本位的视角观察伙伴关系，与西方的“个体本位”视角相区分，并且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伙伴关系进行分类，力图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待伙伴关系的主要内涵和作用。

现实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体，西方将独立的个体视为社会的核心。西方更加关注独立、分离的个体，其理论特点更多是“个体本位”，以个体为研究起点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理性个体自己界定利益。与之相反，中国更加关注处于集体之中的个人，其理论特点更多是关系本位，强调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属性，将个人放在社会脉络中加以理解。[13]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就是更看重关系，更重视社会环境；因为社会环境是由互动的关系构成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网络。中国更倾向于在一个关系网络的整体中寻找联系和规律，关系网络整体会影响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个体，网络中每个个体之间的互动又会影响整体的关系网络。关系就是过程发展变化的动力，过程就是运动的关系。

关系界定和建构身份,行为体的身份和行为意义只有在关系中才能产生。关系能够孕化一种“关系性权力”,关系能够影响权力,并为权力的运作搭建平台;同时关系本身以及整体的关系网络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资源。

三、从过程建构视角看中国伙伴关系

本文以关系本位视角对中国伙伴关系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在强调基础型、特定型和全面型三种类型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还强调伙伴关系的过程建构,强调中国伙伴关系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孕化权力、孕育规范,从而建立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

(一)从关系本位到过程建构

“关系”理论的重心是过程,过程的核心是关系。过程可以导向结果,能够通过关系的流动孕化权力、孕育规范和建构行为体身份。行为体之间相互依存,进行理性和利益考虑,进而能够建构集体情感认同。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但更强调过程。在预知结果难以取得或是暂时无法取得的时候,维持过程可能比达到预期效果更加重要。中国维持各国伙伴关系的过程,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预期结果。即便维系这种伙伴关系无法达成预期结果,过程也通过关系的运动,调整着中国与各国利益和各国对这种利益的认识,协调中国与各方的关注和要求,加强各方对中国的情感认同,因而使中国与其他拥有伙伴关系的国家达成更好的或是比较好的结果。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过程建构

中国伙伴关系既是层层递进的,又是可以相互流动、相互转化的。基于关系本位,中国伙伴关系按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范围、亲密程度、交往程度等标准分为基础型、特定型、全面型三类,这三类关系在原则上是有着层级之分的。基础型关系的目标是最少的,合作的也仅是具体的专业项目,合作领域也较为狭窄,合作程度也是相对松散的,可以算是基础级别层级的关系;特定型关系是一种中级过渡层次的关系,可以说是基础型关系的发展升级,合作范围不再局限于具体事务,而是集中于相关领域,合作程度也更深;全面型关系可以说是三类关系里面最高层级的关系,其合作范围最广,合作程度最深。这三类关系不仅是层层递进的,还是可以流动且互相转化的。

中国伙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但又是相对稳定的。中国与不同的国家建立哪种类型的关系都是要经历一段较为长时间的考验的。伴随着历史背景、国际局势、国内情况、意识形态、国家立场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和积淀,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也不是完全固定的,都会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伙伴关系可以升级为全面型关系,也可能因为一些重大原因降级于基础型关系;但这种关系又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在涉及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其决定都是慎重的,其关系也不会轻易改变。伙伴关系一旦确定,两国的交往互动过程就会基于此关系不断流动发展,双方会维系、发展这种伙伴关系,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奋进,即使不能到达目标,双方也会因为有着共同目标而调整双边利益和关系,从而达到良好的结果。如果随意变动这样的伙伴关系,就可能导致两国合作中断,影响两国利益,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

(三)中国伙伴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

与同盟关系与共同体关系相比,伙伴关系更加像一种“朋友”关系,赋予单纯协调国际合作、利益分配的关系更多的感性因素。伙伴关系更加具有灵活性,维系的这种关系需要在合作中深化彼此的信任,不同于同盟关系需要共担责任与义务,也不同于共同体关系以身份认同为前提的规定;中国伙伴关系强调一种非对抗非冲突的状态,是以尊重各国、平等相处、互利共赢为标准的一种关系,

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的发展目标的。中国的外交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以和为贵”的发展理念,并且在延续了“天下大同”世界秩序的追求中逐渐形成的,也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外交实践中探寻出处理对外关系的模式——伙伴关系。

具体来看,中国伙伴关系先于新型国际关系出现。中国伙伴关系是在尊重实力差异、立场差异以及国家发展规模差异之下的不对称伙伴关系,同时也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和谐合作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承认世界上仍然存在结盟政治,但更希望各方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中国伙伴关系就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合作共赢理念的政治体现,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就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中国基于各国共同利益维系关系,主动与各国建立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道路;在不断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维系关系,这种互动中的关系推动了关系性权力、共有规范和集体情感的产生,推动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产生,同时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进而可能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中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过程首先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次是与周边国家建交,通过领导人访问等形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然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且大力加强与上合组织、东盟等发展伙伴关系,加强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安全领域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最后是推动“一带一路”发展,通过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的形式带动各国发展,不断加强关系,进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四、伙伴关系的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伙伴关系与国际社会其他一些伙伴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国际上的一些伙伴关系只是为完成在特定专业事务和特定领域有着具体目标的国际合作,而中国伙伴关系致力于在国家战略层面促进与不同国家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同时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从而达到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正因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与不同的国家达成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以此作为关系本位,构建伙伴关系的双方就孕育了中国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共有规范和规则,使得双方交往有了更多的积极意义,催生了集体认同和集体情感;在这种过程建构中规定了中国以及各国的利益,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模式,让中国可以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与各国和睦相处,同时实现互利共赢,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朝着最终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的方向而努力。

五、总结

本文以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视角研究中国伙伴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逻辑联系,将“关系”视为核心,认为中国构建伙伴关系的过程就是维系关系,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从而能够通过维系、建构这样的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 [1]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 [2]朴光海.新冠疫情下的中韩关系及其发展前景[J].当代韩国,2020年第2期.
- [3]赵鸣文.中俄关系: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J].《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3期.
- [4]胡健.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J].欧洲研究,2018年第2期.